

# 人类学的现代性转向

## ——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评述\*

何明 张方亮

**内容提要**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一直有研究初民社会和族别社会的刻板印象,而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努力把人类学拉回现代生活,并赋予其探讨现代性议题的能力。本文系统地梳理并分析了博厄斯学派国族研究的理论方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力图为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摆脱“初民社会”和“族别”研究范式的束缚,把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等运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研究,为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提供理论方法的参考和经验教训的借鉴。

**关键词** 博厄斯学派 国族研究 文化分析

初民社会的研究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和传统。近代以来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的殖民扩张催生出民族学/人类学,早期民族学/人类学专注于初民社会的调查研究,从进化论到结构-功能主义均如此。博厄斯学派开展过一系列美国及美洲原住民的调查研究,如他本人的《原始人的心智》《原始艺术》及其众多弟子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研究等,于是国内学界一直视之为与其他早期人类学学派一样的初民社会研究者,形成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只能从事初民社会研究和族别社会文化研究而无力研究现代国家及其国族的刻板印象。事实上,早在1928年,博厄斯写就《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一书,针对对于人类学的误解,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人类学通常被认为是一门搜集各种奇风异俗,说明异地居民的奇异长相并描述其独特风俗和信仰的学科。它被认为是供人消遣的学问,显而易见与现代文明社团生活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sup>①</sup>并说:“以下各章中的内容,将继续讨论人类学用纯科学观点来分析研究现代生活中的问题。”<sup>②</sup>基于这一理念,博厄斯努力把人类学拉回到现代生活,赋予其现代性的能力,其中最具成效的工作就是带领弟子们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调查研究现代国家背景下的国族和国族建设。

“国族”(nation 或 nationality)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存在巨大差异。它曾经被视为部落(tribe)或族群(ethnic group)的同义词,都指称共享共同语言、宗教、历史、地域等的群体。进入现代,在“一族一国”的现代国家理想蓝图架构下,“国族”(nation)与“国家”(state)基本变成同义词,并组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用于指代拥有独立主权的政治实体,只是“国族”(nation)侧重于指代国家中的人群,而“国家”(state)更偏重于指代国家机构。由于历史、移民、征战和殖民等原因,绝大多数情况下,族群的地理分布与国家的领土范围之间并不完全重合。于是,在当今世界,按“一族(群)一国”模版建成的国家为数不多,多数国家均为“多族(群)一国”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编号:16ZDA151)阶段性成果,获得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工作站支持。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美]弗朗兹·博厄斯著,刘莎、谭晓勤、张卓宏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② [美]弗朗兹·博厄斯著,刘莎、谭晓勤、张卓宏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7页。

的模式。对于“多族(群)一国”的国家而言,把由多族群、多种族、多国移民等相互区别而不相统属的各个国民群体,整合成与国家边界重合并密切联系的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共同体即“国族”,建成更高层次的“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显然是强化国民团结、夯实国家根基的国家建设必由之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然而,受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专门研究前现代社会的刻板印象、初民社会研究范式、族别研究惯性、对博厄斯学派片面认识等的影响,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被闲置,形成研究成果“三多三少”(即政策解读多、逻辑推导多、宏大叙事多,事实调查少、个案积累少、深入分析少)<sup>①</sup>现象,并存在着原理性和学理性的研究不足等问题,其中原因之一是以族群、民族、国族等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削弱了学术研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支撑力度。

有鉴于此,本文拟较为系统地梳理与分析博厄斯学派国族研究的理论方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以纠正博厄斯学派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局限于初民社会的误解,摆脱“原始民族”和“族别”研究范式的束缚,把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等运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 一、国族及其文化

作为人类学家,博厄斯及其弟子从文化角度研究国族。博厄斯认为,文化是“包括社区中所有习惯,个人对其生活的社会习惯的反应,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人类活动”<sup>②</sup>。他将文化与种族概念分开,将群体性差异归于文化而非种族。据此,博厄斯学派使用文化作为核心概念,并通过三代弟子分别发展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三条路径:文化历史研究、语言研究和文化心理研究。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基于其美国国民的主位视角,聚焦于美国的国民性及其文化模式,也关注到其他国家的国民性与社会文化,并将“他者”文化视为可比较和反观自身的对象,进一步深化美国国民的文化意识和差异意识。

首先,博厄斯论述了国族的内涵,强调国族的政治属性和情感属性。博厄斯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sup>③</sup>一书中区分了“nationality”和“nation”这两个概念。他指出,nationality既指一个国家的公民集合体,也指拥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而不考虑其政治派别的群体;nation则指一个政治实体、一个国家,有时也指一个nationality的集体成员。<sup>④</sup>博厄斯认为nationality包括不分政治派别的文化共同体,但他在之后的论述中常将nationality限制在国家政治派别内,因此本文将《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一书中的nationality翻译为“国族”。

在论述文化与国族关系时,博厄斯强调共同的教育和共同的情绪,他指出:“在拥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情绪的教育者群体中,可以发现统一”,而“国家的形成,既不是单独由血统的结合,也不是由于语言的结合,而是情感生活和社团所组成,它们组成了一种所有人都能自由活动的媒介”。<sup>⑤</sup>博厄斯认为,民族主义与国族(nationality)一样含糊不清,“它被用来表示团结的情感,以及作为公民为国家的利益而献身的情感。它也被用来指一个国族的渴望:即为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统一而感

① 何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载《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D. Lasswell Harol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 46, no. 3, 1936.

③ 注:部分内容根据英文版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Routledge 出版社, 2021 年版重新翻译。

④ [美] 弗朗兹·博厄斯著, 刘莎、谭晓勤、张卓宏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华夏出版社, 1999 年, 第 51 页。

⑤ [美] 弗朗兹·博厄斯著, 刘莎、谭晓勤、张卓宏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华夏出版社, 1999 年, 第 58 页。

觉它的文化一致”<sup>①</sup>。现代民族主义(The nationalism of modern times)的前提是作为一个民族聚集在一起的群体已经产生了加强其共同社会生活的愿望,可自行决定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成为一个有能力控制自己主权的国族。结群的动力来自观念的情感诉求,这种观念将每个群体成员团结在一起,从而提升团结和伟大的感觉,以至于不可能与其他群体达成妥协。人类结群的需求会逐步扩大,从部落扩展到州、国家,甚至是全球性联盟。但现代民族主义与早期结群情感不同,形成现代国族的关键不仅是语言的统一,更重要的是组织和平与冲突的社团。<sup>②</sup> 由于国族是在各种环境中产生,“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文化接触会打破一个国家,并产生新的国族”。因此,当“国家权力成为国家内所有合作群众理想的执行者”时,才能形成统一于国家政体下的国族。<sup>③</sup> 而“一个国家内的全体人民能享受差不多平等的利益”时,才能减少国族内部冲突的发生。<sup>④</sup> 与此同时,博厄斯论述了国家间冲突的根源,他认为“形成敌对的群体没有任何理性的原因,只是基于一种观念的情感”<sup>⑤</sup>。一旦过于强调国家的政治权力和个体对国家的奉献精神,必然导致国家间的战争和屠杀,损害人类的整体利益。因此,教育需要重视文化民族主义,通过教育强化爱国主义的神圣性,并强调国家自卫是首要义务,减少侵略性的民族主义。<sup>⑥</sup>

虽然博厄斯论述的国族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族”,但他洞察到了国族结群的情感基础,国族诉诸于虚构的世族起源主要是为了延续基于世族的观念性情感,以此创造凝聚力。他的观点区别于安德森、盖尔纳和霍布斯鲍姆将国族视为现代性产物的观点,强调国族构建中所延续的前现代社会中的结群情感以及现代国家构建的文化统一性。基于此,博厄斯学派的弟子从文化和心理入手分析国族的相关问题,并逐渐发展了国民性研究和国族社会文化研究。

其次,博厄斯的文化观点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每种具体的文化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整体,只能从历史上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在个体层面上存在一个文化整体,个体必须以某种方式综合文化和历史上的零散经验以形成完整的自我。在个人经验中,人类学家可以发现某种形式的文化整体。<sup>⑦</sup> 因此,博厄斯的弟子既关注相对独立的族裔文化,也强调国族文化的整体性。

最后,博厄斯强调尊重多元文化的价值,即对不同文化形式的包容以及对不同文化价值的尊重,以文化平等构建国家内部各族裔的和谐关系。<sup>⑧</sup> 他认为,国家内部应保护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会成为国家有机体发展的动力。博厄斯学派对多元文化价值的推崇,导致该学派的众多弟子都成为新进化论者,他们认为尊重多元文化价值的社会比种族主义的社会更好。

结合博厄斯的国族定义,本文认为国族不是一个“虚构的传统”,也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国族是不同族群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与融合中所形成的,具有共同历史、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政治理想的共同体。这与公民民族主义所强调的国族是一个政治统一文化多元的共同体概念有所区别,也与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提出的长时段“国族”理论<sup>⑨</sup>有所区别。本文认为,国族是在“自我”与“他者”长期的比较、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具有独立的国家主权、领土和

① [美] 弗朗兹·博厄斯著,刘莎、谭晓勤、张卓宏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② [美] 弗朗兹·博厄斯著,刘莎、谭晓勤、张卓宏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③ [美] 弗朗兹·博厄斯著,刘莎、谭晓勤、张卓宏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④ [美] 弗朗兹·博厄斯著,刘莎、谭晓勤、张卓宏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⑤ [美] 弗朗兹·博厄斯著,刘莎、谭晓勤、张卓宏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⑥ Franz Boas,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Routledge, 2021, p. 56.

⑦ Franz Boas, “The Aims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Science*, vol. 76, Issue 1983, 1932.

⑧ [美] 弗朗兹·博厄斯著,项龙、王星译:《原始人的心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⑨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国族是“具有名称,在感知到的祖地(homeland)上居住,拥有共同神话、共享历史和与众不同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法律与习惯的人类共同体”。参见[英] 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法律体系,国族内部成员共享一套历史叙述、语言和文化,从而具有共同的心理认同基础,并通过共同的政治理想整合成为一个整体。1988年,费孝通在反思西方“国族”(nation)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sup>①</sup>的论点,并重提中国人具有独特的心态,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统一性的重要基点。本文在博厄斯学派国族研究的基础上延续了费孝通的理路,重新对国族概念进行定义和反思。

## 二、国族研究与美国的国族建设

### (一)“自我”研究:美利坚国民性

国民性研究是将人类学分析技术应用于复杂社会的早期尝试,始于文化与人格研究。“文化与人格”研究最早由博厄斯的第二代弟子爱德华·萨丕尔于1930年在耶鲁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提出并理论化。萨丕尔批判所有形式的文化物化,他认为唯一具有现实性的是社会互动中的文化性格。<sup>②</sup>之后,米德和本尼迪克特以文化与人格研究分析国族,开创了国民性研究。国民性研究具有两个突出特征:其一,选择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或主体——“国民”(nationals)作为研究对象;其二,重点关注国民的心理文化特质并将其标签化。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联合舰队对美国海军夏威夷军事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发动了突然袭击,致使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三周后,美国人类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召开会议,米德、本尼迪克特和其他人类学家表示全力支持美国政府打赢这场战争。虽然也有部分学者态度暧昧,但是该学会通过一项决议,将所有学会成员的资源 and 专门技能交由国家支配,以争取美国赢得这场战争。到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类学会已成为各政府机构在军事行动和情报收集方面的“代理信息交流中心”<sup>③</sup>。在此背景下,玛格丽特·米德于1942年出版了《时刻准备着:一个人类学家看美国》(*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的研究报告,阐述美利坚国族文化特性。该研究报告旨在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规划战争,使人民的能力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时刻准备着》一书主要论述了一个普遍的国族性格在战时的有效性。米德从熟识的“文化濡化”视角出发,参照美国的教育实践与家庭结构,论述美国的国民文化特性。米德基于美国的家庭结构,即父母趋向于向孩子展示自己好的一面,决定了孩子长大后发现父母不完美时会趋向于在别的地方找更好的生活方式,说明美国的道德主义与美国文化中个人追求永久的进步有关,美国人总是希望不断向前,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sup>④</sup>其次,米德指出,美国人是一个相信自己胜过父母的民族,孩子被期望超越父母,变得更聪明、更强壮、更勇敢,因此美国人从不守旧,总是不断前进,寻找新的生活方式。<sup>⑤</sup>再者,米德认为,美国的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基于阶梯的分类,人们被期望向上爬,而不是基于社会的有序分层或阶级化。<sup>⑥</sup>因此,美国的阶层流动体系只有足够灵活,才能适应不断

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26页。

② Edward Sapir,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Personality in a Study of Cultur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5, no. 3, 1934.

③ Masco Joseph, “Anthropological Intelligence: The Deployment and Neglec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 vol. 34, no. 2, 2011.

④ Margaret Mea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42, pp. 24–26.

⑤ Margaret Mea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42, p. 98.

⑥ Margaret Mea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42, p. 37.

变化的条件,而这种灵活性必须通过保持种族多样性获得。

米德将美国视为一个可改造和重建的项目。她指出:“美国不是一个血统或出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信仰的问题。”<sup>①</sup>“这不完全是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移民)来说,这是别人的国家。”<sup>②</sup>这是一个不断被侵略的国家,美国人既是侵略者,也是接受侵略的人。<sup>③</sup>这个国家是由人们逃离各种各样的东西建立起来的,这些东西他们有时可能仍然渴望,但是他们不能试图重建。<sup>④</sup>可见,米德认为美国是一个由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组合而成的国家,美国的国族建设应该关注逐步稳固的移民第三代而不是多样化的移民历史。因此,米德在《时刻准备着》中重点研究了美国移民的第三代。她认为,第三代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通过神话、仪式以及被这种系统吸引的人们的日常实践不断重现,这就是作为纳文<sup>⑤</sup>的美国。<sup>⑥</sup>移民第三代拒绝父亲和祖父,支持新的图腾祖先,如华盛顿和林肯,他们象征着一个新世界的“朝向”,定位在“一个我们不完全属于,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实现的世界”<sup>⑦</sup>。因此,米德认为美国是面向未来的,可以忽略不同移民的历史和现实的种族冲突、阶级矛盾,以共同理想和统一的文化性格建构美利坚国族。

在书中,米德区分了种族理论和国族性格。她指出,国族性格是由环境和历史驱动形成的,与国族赖以生存的制度有关,与领导和被领导者之间的联系有关,与国家文化和承载这种文化的人有关。而种族理论则是用一个人的生物特性去判断他的礼仪、道德、智商和行为能力。那么为什么会将“种族”和“国族”混为一谈?米德解释道,种族理论被广泛接受的一个原因是群体外貌特征的明显区别,但这是因为一般人并没有去检验婴儿成人的社会过程,是“社会环境”和“教养”决定了一个国族性格的实质和轮廓。<sup>⑧</sup>

在《时刻准备着》的结尾,米德设想文化差异是一个储藏“珍贵发明”的仓库,社会工程师可以从中汲取重要的教训。与此同时,她断言,一些人类价值观比另一些更好。因此,美国人必须带头创造一个无论是种族、性别还是阶级都将被限制的世界。她认为,这项工作可以为美国人提供一种使命感和挑战感,而这种使命感和挑战感对于他们国族性格的培养来说是必要的。<sup>⑨</sup>事实上,米德对美国文化的赞赏是基于一种无视内部冲突的浪漫化想象,她的一切文化讨论都基于战时民族主义的考虑,而她强调美国应该领导世界建构多元文化的社会暗含了美国文化更优越的价值判断。

《时刻准备着》在其出版后一直备受争议。米德的传记作者简·霍华德(Jane Howard)认为米德在该书中轻率地评价了美国人的性格。<sup>⑩</sup>菲利普·格里森(Philip Gleason)也认为该书是以印象主义的全知全能风格所写作的松散记录,并没有为美国身份和文化的讨论提供新见解。但是格里森也指出,二战带来的“强大的民主复兴”潮流重新激活了对美国身份和文化的持续探索。因此,米德的这本书虽然轻率和松散,但以人类学的专业知识为基础为国民性研究赋予了合法性。<sup>⑪</sup>虽然汉德勒·理查德(Handler Richard)肯定了米德作为公共道德家对美国社会改革的贡献,但他认

① Margaret Mea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42, p. xviii.

② Margaret Mea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42, p. 74.

③ Margaret Mea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42, p. 201.

④ Margaret Mea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42, p. xix.

⑤ 纳文是生活在新几内亚的雅特穆尔人在其青少年成员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后举行的一种庆祝仪式,参见[英]格雷戈里·贝特森著,李霞译:《纳文》,商务印书馆,2022年。

⑥ Margaret Mea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42, p. xxi.

⑦ Margaret Mea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42, p. 53.

⑧ Margaret Mea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42, pp. 18-20.

⑨ Margaret Mea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42, p. 155.

⑩ Howard Jane, Margaret Mead, *A Life*, Ballantine Books, 1989, pp. 271-287.

⑪ Gleason Philip, “Americans all: World War II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3, no. 4, 1981.

为米德对美国国民性的分析始终着眼于跨文化对比,包括与欧洲文化的对比,与美国土著印第安人文化的对比等,从而说明美利坚国族的与众不同。<sup>①</sup>

## (二)“他者”研究:他者的国民性与社会文化

### 1. 日本的国民性研究

《菊与刀》是国内学界最熟知的人类学著作,但许多人并未明确意识到它与其他初民社会研究成果的根本性差异及其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国族研究领域的开拓性意义。此书以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战犯和日本流亡者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学术作品、小说、新闻评论、广播、电影、军事情报机构的报告等,分析阐述日本人的文化性格特征。本尼迪克特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指出日本幼儿教育 and 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她经常运用比较方法,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并以美国的文化价值评判日本的文化价值,认为日本人性格里的矛盾性和极端性在不断塑造日本文化的“怪异”和“偏执”。例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美国人重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无条件越可贵,而日本人却认为一切施恩都有条件。<sup>②</sup>此外,虽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美国文化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但她仍旧肯定自由的个体主义和平等是典型的美国价值观。<sup>③</sup>最后,本尼迪克特得出结论: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在这项研究中,本尼迪克特不仅证明了人类学研究对跨文化交流的潜在价值,并且她的研究说明了解对方的思维过程可以作为战争中的“武器”。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揭开了日本是如何建立其生活方式的,并提供了一个审视日本人如何看待世界和生活的镜头,因此西方人看到日本人行为中的许多矛盾都将不再是矛盾,而是一个内在一致的文化系统。就此,格尔茨评价道,日本人在书的开头是美国人曾经战斗过的最陌生的敌人,在书的结尾却是美国人曾经征服过的最合理的敌人。<sup>④</sup>而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比日本与美国文化系统的差异,也同时在回应美国社会中的问题,这也是该书在美国大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在比较“他者”的过程中,本尼迪克特对美国文明始终持赞赏态度。“自从我们的座右铭是‘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我们提供‘受压迫者的庇护所’并热情洋溢地写下‘熔炉论’以来,美国人的脾气(种族主义)已经改变了”。<sup>⑤</sup>本尼迪克特认为,美国文化模式具有包容性,因为美国文化模式的趋势就是促进同化,族裔歧视是非“美国”的。<sup>⑥</sup>然而,针对移民问题,她又提出美国不能对所有移民敞开大门,应该有所选择,接纳那些社会秩序和生活水平与新白人相似的移民。<sup>⑦</sup>本尼迪克特对美国文明的赞赏在之后受到了嘲讽,马修·弗赖·雅各布森(Matthew Frye Jacobson)质疑道,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时候消除了种族主义的传统?他针对美国独立后的种族主义历史举出了大量例证,包括1790年的归化法将公民身份限制在“自由白人”移民身上,1882年的排华法案,以及美国

① Handler Richard, *Critics Against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Observers of Mass Socie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5, p. 144.

②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河、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4页。

③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河、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7页。

④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方静文、黄剑波译:《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1页。

⑤ Ruth Benedict,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New York: Modern Age Books, 1940, p. 123.

⑥ Ruth Benedict, “Race Problems in Americ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16, no. 1, 1941.

⑦ Ruth Benedict,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New York: Modern Age Books, 1940, p. 123.

1924年的移民法对欧洲移民和亚裔移民的限制使他们无法获得公民身份。就此,雅各布森提出美国人对移民的接受程度总是按照种族和肤色来排序的。<sup>①</sup>

国族研究虽然在人类学界获得巨大成功,但同时也遭致各种非议,其中的争议之一在于将国族文化视为均质化和相对静止的整体。有学者指出,构建文化模式的优势是创建容易被迅速吸收的标签。<sup>②</sup>为此,国族研究必然是简化的。而米德强调国族研究是一项应用研究,是为自己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服务的,研究必须具有时间范围和时代特质。<sup>③</sup>格尔茨更明确地说明了国族研究的特殊性,本尼迪克特和米德讲述的民族学故事明显涉及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与不同的价值观念作斗争,与既定传统的明显崩溃有关,与人类可塑性的乌托邦愿景和对分解的恐惧有关<sup>④</sup>。而克鲁伯针对国族研究的政治意图及其遭致的非议辩护道,国族研究不仅是一项人类学研究,更是一项社会工程,它使美国国民更具有文化意识。<sup>⑤</sup>

## 2. 海地的社会文化研究

博厄斯学派的另一位学者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研究了海地的社会文化。赫斯顿是博厄斯学派较为罕见的黑人女性,她一生都致力于收集黑人神话、歌曲与故事,她对黑人新形象的描述使她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黑人女性作家和人类学家之一,并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sup>⑥</sup>的奠基人。赫斯顿是多面而矛盾的,她作为黑人女性始终对美国具有一种复杂的情感。赫斯顿在她的第一本书《奴隶收容所:最后一个“黑货”的故事》(*Barracoon: The Story of the Last "Black Cargo"*)中,基于对一名老年非洲奴隶库乔·刘易斯(Cudjo Lewis)的访谈,从黑人奴隶的角度叙述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由于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冒犯了非裔美国人,且书中使用了大量的黑人俚语,直到70多年后才出版面世。这本书不但批判了白人奴隶主,还控诉了帮助白人捕获黑奴的非洲人。但之后,赫斯顿写作了黑人女性身份认同的小说《他们的眼睛注视着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关注了黑人的身份觉醒与国家认同问题。此后,她发表了一系列黑人民间故事集,如《骡子和男人》(*Mules and Men*),并宣称对黑人民间故事的记录是在保存美国文化中美丽而重要的部分。由于对美国的复杂情感,赫斯顿对美国以外社会的研究始终处于一种矛盾中。在海地的研究中,赫斯顿一方面肯定美国对海地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认为海地巫术仪式的“精神占有”可以帮助海地人民对抗殖民统治,这显示出博厄斯学派学者在“他者”建构中的矛盾性——既试图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又一再凸显美国的优越性。

1938年,赫斯顿出版了《告诉我的马:在海地和牙买加的伏都教与生活》(*Tell My Horse: Voodoo and Life in Haiti and Jamaica*)一书,开启了她对美国以外社会的关注。该书并非一本扎根于海地的人类学专著,而是她作为伏都教徒,根据自身在海地和牙买加的经历写作的一本游记。该书并没有深入探索海地的文化,而是考察了牙买加乡村的种族态度、宗教和死亡仪式、男女关系以及妇女在加勒比社会中的地位。其中,种族歧视、男性沙文主义和阶级压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发现,肤色和阶级问题交织在海地生活的所有方面。赫斯顿从牙买加乡村内部人士对伏都教的看法切入,研

① Jacobson Matthew Frye, *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3.

② Jeremy MacClancy, "Popularizing Anthropology", in Jeremy MacClancy et al. (eds.), *Popularizing Anthropology*, Routledge, 2002, pp. 13-69.

③ Margaret Mead and Rhoda Métraux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④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方静文、黄剑波译:《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4—180页。

⑤ Alfred Louis Kroeber, *Ruth Fulton Benedict: A Memorial*, New York: Viking Fund, 1949.

⑥ 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Harlem Renaissance):是一场主要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黑人文化复兴运动。它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种族歧视,批判并否定驯顺的旧黑人形象,鼓励黑人作家在艺术创作中歌颂新黑人的精神,树立新黑人的形象。

究海地的种族与阶级分层的问题。她提出,对伏都教(Voodoo)的态度一直是海地社会阶层之间动态变化的核心。通过分析伏都教与阶级的关系,赫斯顿发现海地民众对伏都教存在公共和私人叙事的差异,这种双重叙事将农民和精英阶层一分为二。赫斯顿记录了上层海地人对伏都教的负面偏见,他们否认伏都教祭祀的存在,“上层海地人深受伏都教传统的影响,但他会用‘撒谎’来维护自己和民族的骄傲”<sup>①</sup>。因为在所谓“文明”的美国人眼中,伏都教是“野蛮的”,上层海地人受到美国殖民者的影响,并不承认他们文化与伏都教的关系。这种基于上层阶级的公众叙事与海地农民的故事和文化习俗截然不同,海地底层民众参与伏都教是他们对于现状不满的一种隐性抵抗。<sup>②</sup> 底层农民对伏都教的解释是一种不服从命令的叙事,拥有颠覆政治的力量,赋予加勒比地区黑人超越公共叙事和管控的文化记忆和实践。赫斯顿认为,伏都教通过团结被压迫的人民,帮助加勒比人摆脱殖民奴役并建立独立的社区。因此,伏都教是一种“创造和生活的宗教”<sup>③</sup>,它可以通过“精神占有”创造共同体,并持续提供内在的连贯性和逻辑性。通过研究海地不同阶层对伏都教的不同态度,赫斯顿试图以美国文化的“文明”理念将伏都教“野蛮化”。虽然她肯定伏都教在对抗殖民统治时的功能,但她也一再强调其“异域性”,从而将海地文化构建为不同于美国文化的“他者”。正如琼·达扬(Joan Dayan)所说,在美国占领海地期间,关于海地传统文化中吃人、酷刑和僵尸的故事不断在美国出版,投射出海地“食人”的幻象才可以证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海地的“公民化”存在。<sup>④</sup>

赫斯顿在《告诉我的马》一书中提出了非常激进的政治观点,在“海地的政治和人格”一节中她赞扬了美国对海地长达9年的占领,这来源于她基于物质公平而非社会正义理论的种族进步观点。赫斯顿将美国对海地的军事占领视为对海地经济的改善,“占领结束,海地拥有稳定的货币,交通系统的初步建设,现代化的首都,现代化的军队”<sup>⑤</sup>。赫斯顿认为正在蔓延的饥饿和匮乏可能会导致种族和阶级的社会不平等,因此族裔领袖应该是实干家而不是空想家。据此,她将海地问题引向美国黑人的族裔政治,“美国产生了一代对黑人种族领袖不耐烦的黑人,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工作、房子和餐桌上的肉”<sup>⑥</sup>。赫斯顿以殖民促进海地经济平等和物质公平的观点,掩盖美国剥夺海地政治独立的帝国主义行为,并以社会发展论宣扬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赫斯顿认为海地被美国统治是一件好事,至少改善了海地的经济状况。但在海地当过美国大使的黑人政治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却不这样认为。道格拉斯申明,海地与美国一样都有自己的主权,且海地的民族主义不同于美国的民族主义,海地民族主义应被纳入全球离散黑人为寻求自由的广泛而持久的革命中。<sup>⑦</sup> 赫斯顿在《告诉我的马》中的政治立场被黑泽尔·卡比(Hazel Carby)认为是反动、盲目爱国和肤浅的。<sup>⑧</sup> 即使是立场较为中立的学者也认为,赫斯顿对美国殖民主义的讴歌体现

① Hurston Zora Neale and Henry Louis Gates, *Tell My Horse: Voodoo and Life in Haiti and Jama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9, p. 83.

② Hurston Zora Neale and Henry Louis Gates, *Tell My Horse: Voodoo and Life in Haiti and Jama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9, pp. 92 - 94.

③ Hurston Zora Neale and Henry Louis Gates, *Tell My Horse: Voodoo and Life in Haiti and Jama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9, p. 113.

④ Dayan Joan, “A Few Stories about Haiti, or, Stigma Revisited”,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35, no. 2, 2004.

⑤ Hurston Zora Neale and Henry Louis Gates, *Tell My Horse: Voodoo and Life in Haiti and Jama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9, p. 74.

⑥ Hurston Zora Neale and Henry Louis Gates, *Tell My Horse: Voodoo and Life in Haiti and Jama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9, p. 77.

⑦ Castronovo Russ, “‘As to Nation, I Belong to None’: Ambivalence, Diaspora, and Frederick Douglass”, *ATQ - KINGSTON*, vol. 9, no. 3, 1995.

⑧ Hazel V. Carby, “The Politics of Fiction, Anthropology, and the Folk: Zora Neale Hurston”, In M. Awkward (ed.), *New Essays on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1 - 94.

了她对美国意识形态灌输缺乏警惕。<sup>①</sup>

无论是本尼迪克特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还是赫斯顿关于海地社会文化的研究,抑或米德的萨摩亚青少年研究,其中都存在对异文化的刻板化呈现,其内在逻辑都是制造“他者”以美化“自我”。她们通过对其他社会的分析助推了国族文化和社会优劣性的比较,美化美国文化模式,强调国族的差异性。特别是她们对美国文化不假思索地赞同和肯定以及对其他国家文化和社会的贬低和否定,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的自我意识,推动美国构建统一的国族文化意识和优越感,但这也违背了博厄斯学派文化多元和价值平等的宣言。由此可见,她们坚持的是美国内部的文化多元和价值平等,对外则未必如其所言。

### 三、方法论:远距离文化研究

战争和国家冲突的背景刺激了博厄斯学派海外研究方法论的发展。1953年,米德和罗达·麦克特罗(Rhoda Metraux)主编了《远距离的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一书,汇集了一系列国族研究人员的论文。这些研究人员从1947年起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为鲁丝·本尼迪克特指导的“当代文化研究”(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项目工作。事实上,《远距离的文化研究》一书是1951年秋天预先提交给海军研究办公室初步草案的浓缩版本。在该书中,不同的学者讨论了不同国家的国族性,包括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波兰、叙利亚、泰国等多个国家。在该书中,米德和众多研究者将国民(nationals)作为分析单位,提出了“远距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

米德在《远距离的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国民性研究是一种应用人类学,目的是在国家层面上提出建议,或者对在国家定义的背景下行事的个人行为进行预测。因此,国民性研究必须为文化划定范围,包括群体规模和研究时长,否则将难以为政策提供有效意见。<sup>②</sup>但是,无论如何划定研究群体的范围,都必须注意该群体所涉及的更大整体,并划定该文化系统的参照系,及其与更大系统的关系。<sup>③</sup>这种方法是本尼迪克特基于古典人类学的比较方法提出的,而本尼迪克特的比较方法来源于博厄斯的文化区方法和文化特征论。同处于一个文化区的所有社会组成元素具有相同的历史传统,他们会获得同样的文化内容。而将文化行为确定为文化特征时,这是讨论文化区最便利的分析单位。<sup>④</sup>总体来说,国族研究就是将国族视为分析对象,将国族文化特征作为分析单位,通过比较其他的国族文化确定自身位置,并据此为国家政策和战略提出建议。

米德指出,文化是一个群体成员共享的学习行为系统,其中的主要模式是一个持续了很多代人的完整社会。“一致的行为规律和文化规律才能被称为文化心理,这样的规律可以被组织成关于阶级、仪式、梦想象征或自我的广泛陈述”。<sup>⑤</sup>因此,国族研究需要借鉴精神分析理论和儿童教养理论,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互动。研究方法应包括:人类学的访谈技巧、分析文学作品抑或电影的

<sup>①</sup> Trefzer Annette, "Possessing the Self: Caribbean Identities in Zora Neale Hurston's *Tell My Hors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vol. 34, no. 2, 2000; Rowe John Carlos, *Literary Culture and US Imperialism: From the Revolution to World War II*, Massachuset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p>②</sup> Margaret Mead,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in Margaret Mead et al.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pp. 23 - 24.

<sup>③</sup> Margaret Mead,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in Margaret Mead et al.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p. 30.

<sup>④</sup> Margaret Mead,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in Margaret Mead et al.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pp. 26 - 27.

<sup>⑤</sup> Margaret Mead,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in Margaret Mead et al.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p. 32.

技能、识别心理动力模式并将这些模式与文化联系起来的能力等。<sup>①</sup>

人类学研究者可以通过自身整合文化完形的能力,以个体象征行为的线索来描绘集体性格或某一时期的文化模式。在描述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将自己的感知作为搜索工具以收集大量信息,包括行为、书面或口头文字、手势系统、仪式、亲属关系、文学或电影作品、建筑或设计中的空间安排、舞蹈等。研究人员的目标是描述和分析那些没有意识的行为或深层的符号系统,而这些行为是身处其中的个体无法意识到的。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后,人类学家再以系统化的方式绘制文化模式。<sup>②</sup>这就对人类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具备处理图像和感知模式的天赋,还需要具备串联起不同线索的联想能力、分析思维以及重新创造的能力,才能在使用特定材料(访谈、电影、艺术形式、游戏、俚语等)的基础上描绘更整体性的文化以及个体的学习行为。<sup>③</sup>

远距离文化研究具体的操作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深入调查和观察一个报道人来了解整个社会;二是生活在一个小社区中,通过参与式观察分析其中的关系网络和社区的行动事项。首先,米德认为人类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不是有多少个报道人,而是有什么样的报道人。研究者需要深入了解报道人的背景、生活经历、行为倾向和思维模式,而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只是深入访谈,而是对报道人深刻的观察和理解。虽然不同的报道人有不同的秘密,纵使内容有所不同,但秘密的基调是一样的,因此只要有一个深入的报道人,就可以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文化。米德和本尼迪克特过于依赖单一报道人的研究方法来自博厄斯的传承,博厄斯认为一个信息提供者可以代表整个群体。对此,沃尔特·戈德施密特(Walter Goldschmidt)指出,这样的研究方法暗示了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解决群体内的权力问题。<sup>④</sup>珍妮·希钦(Janine Hitchen)也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只适用于小规模、无阶级的社会,并不适用于大规模现代社会的讨论。<sup>⑤</sup>其次,人类学家要在一个社区内连续工作一段时间,了解社区内的关系网络,并且跟踪调查不同社会类别和不同性格的人对社区事件的不同反应。<sup>⑥</sup>而这类田野调查的数据和资料主要用于说明学习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原理。同时,人类学家需要将两种方法合并,既需要增进对文化的了解,也需要增进对个体信息提供者的了解,同时进行和展开对个体心理、社区内关系网络和内在文化模式的分析。就此,米德提出了更细化的研究方法:其一,同时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个体进行交叉研究;其二,对选定的个体进行详尽的生命史研究;其三,详细记录个体生活的片段;其四,详细分析个体创造的产品和个体表达;其五,对个人进行心理分析。<sup>⑦</sup>

#### 四、博厄斯学派国族研究的启示

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启发了文化民族主义理论的探索<sup>⑧</sup>,正如伯恩哈德·斯特恩(Bernhard

① Margaret Mead,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in Margaret Mead et al.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p. 4.

② Margaret Mead,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in Margaret Mead et al.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pp. 10 - 11.

③ Margaret Mead,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in Margaret Mead et al.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p. 12.

④ Walter Goldschmidt, "Introduction",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1, no. 5, 1959.

⑤ Hitchens Janine, "Critical Implications of Franz Boa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vol. 19, 1994.

⑥ Margaret Mead,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in Margaret Mead et al.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pp. 47 - 48.

⑦ Margaret Mead,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in Margaret Mead et al.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p. 34.

⑧ Hutchinson George, *The Harlem Renaissance in Black and Whi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09.

J. Stern) 所说,“国族思想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sup>①</sup>。自博厄斯去世后,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也受到了诸多质疑。批评者认为,博厄斯学派支持文化同化政策,以消除土著和有色人种文化的方式构建国族。<sup>②</sup> 因此,梳理与反思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及后世学者的批判分析,可以为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提供理论方法的参考和经验教训的借鉴。

其一,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具有研究现代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潜力和优势。我国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大部分成果集中于村落、社区、具体文化事象等微观研究和少数民族、农民工等群体研究,于是形成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无力研究宏大议题和主流群体的刻板印象。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表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并非只能用于初民社会和微观议题,完全具备有效解释现代社会和回应宏大论题的潜能。不仅如此,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等研究成果被成功应用于国家建设,显示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国族及现代国家建设研究具有独特的优势,其深刻的洞察力、精准的判断力和实践的转化力超过当时其他学科研究同样议题的成果。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传入后经历了百余年的中国化历程,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无论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还是民族识别,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所做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调查,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无论是国外的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还是费孝通先生创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都有力地证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不仅调查研究小型社会、村落和族别的社会文化可以取得有价值的成果,而且调查研究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及其国族也完全能够取得具有理论创见和实践意义的成果,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应该建立学科自信和学术自信,以费孝通先生为楷模,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同时借鉴外国国族研究成果的有益经验和理论方法,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新时代的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调查研究之中。

其二,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有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知识支撑。在多民族国家,国民由多个民族构成。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具有差异性的各民族整合进统一的国家之中,建构“多元一体”的国族文化和相互依存团结共进的共同体意识。犹如将众多的零配件组合成一台机器,若对各个零配件的性能、位置及原理等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怎么可能将散乱的零配件组装成一台能够有效运行的机器? 博厄斯坚持认为要解释更大范围的普遍性和一致性,必须通过分析大量的实地研究数据,以进行解释性概括。<sup>③</sup> 因此,博厄斯学派以文化人类学/民族学长期调查研究印第安人、非洲人等少数族裔的学术积累为基础,发挥学科田野调查和文化解释优势,开展本国和他国的国族及其文化建构调查研究,不仅取得理论上的重要成果,而且其中的一些成果转化为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的实践。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长期致力于小型社区、村落、族别的社会文化研究,尽管这些研究乍看似乎与强调政治性的国家建设和统一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南辕北辙,但从学术研究的整体性和长远性来看,这些研究恰恰是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和起点,只有深入准确理解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才能提出有效整合各民族为中华民族的观点、思想和方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

① Bernhard J. Stern, “Franz Boas as Scientist and Citizen”, *Science & Society*, vol. 7, no. 4, 1943.

② Sanday Peggy Reeves, “Skeletons in the Anthropological Closet: the Life and Work of William S. Willis, Jr”, in Ira E. Harrison et al. (eds.), *African American Pioneers in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p. 243 – 264.

③ Krupat Arnold and Franz Boas, “Anthropology in the Ironic Mode: The Work of Franz Boas”, *Social Text*, no. 19/20, 1988.

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就意味着不仅需要政治学的政治视角的研究和理论支撑,不仅需要历史叙述的重构,而且需要以文化为研究焦点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提供事实依据和理论支撑。

其三,对于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及其理论方法需要持有批判性思维而不能照搬照抄,从中国、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实践经验出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自主知识体系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的目标。上文所述,博厄斯学派的国族研究在意识形态、理论方法和思想观点等方面存在缺陷、漏洞乃至谬误。首先,米德以第三代美国人的性格心理特征构建美国文化模式,但是她并没有关注种族差异,而是以浪漫化的想象构建美国国民性格,因此她忽略了美国种族歧视的问题。其次,虽然米德和本尼迪克特都强调国家对多元文化的保护,但她们认为美国的国族建构应遵循熔炉论,不同种族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国族。在面对谁融入谁的问题时,她们认为应该由不同的移民融入盎格鲁-撒克逊新白人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文化。由此可见,她们的国民性研究实际上暗藏了文化优劣的价值判断。虽然博厄斯学派的学者都驳斥种族主义,但他们却建立了一种以文化而论的人类不平等观念。米德和本尼迪克特认为美国文化将领衔人类文化发展,实际上是用文化论替代进化论,骨子里还是认为人类不平等。最后,博厄斯学派以刻板化呈现“他者”的方式美化美国,并强行输出美国模式,体现了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治世逻辑。不仅如此,美国的国族与我国的中华民族存在着巨大差异。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形成并不断加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和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关系。而美国的历史较短,且为典型的移民国家,除规模很小的原住民外,大多数国民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世界各地移民而来的,而民族构成不仅有来源、历史、文化等差异,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种族的生理遗传差异。为此,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及各民族的实际状况,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挖掘与运用中国优秀的民族思想和智慧,批判性借鉴外国族研究的理论方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造具有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和国际影响的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有效的学术支持。

**Abstract** Ethnography/cultural anthropology has been stereotyped as the study of primitive and ethnic societies, while the Boas school of nation studies has tried to bring anthropology back to modern life and give it the ability to explore modern issu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Boas School's nation studies, and tries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primitive society"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ethnography/cultural anthropology, so as to apply field studies and ethnographic methods to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s and lessons for the study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何明,教授;张方亮,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昆明,650091)

[责任编辑:邓颖洁]